

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三十九号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

——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王仲殊先生领导下长期在考古研究所工作过的年逾六旬的一批学者和一些敬仰王仲殊先生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为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集体撰写的论文集。所收46篇论文涉及史前时代至宋元明时期；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古代墓葬、聚落、城址的研究，也有关于手工业考古、佛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科技考古等诸领域的专题研究，更有不少是关于考古遗物的各种专题研究，以及田野考古管理的探讨等。这些论文，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事业繁荣发展的时代图景。论文集卷首载有《王仲殊先生传略》和《王仲殊先生著作目录》。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物、博物馆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考古、文物工作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9

(考古学专刊. 甲种；39)

ISBN 978-7-03-045732-5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265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 责任校对：彭 涛

特约编辑：顾智界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4 1/2 插页：1

字数：1 052 000

定价：3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 SERIES

TYPE A No. 39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NEW CENTURY
(Continued)**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 Wang Zhongshu on
the Occasion of His Ninetieth Birthday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Press

Beijing 2015



王仲殊先生肖像

序

1950年7月，王仲殊先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同年8月1日成立，亟需吸收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先生推荐，主持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副所长梁思永先生欣然接纳王仲殊先生入所。就在研究所成立几天后，王仲殊先生到研究所报到。梁思永先生接见了王仲殊先生，并多加勉励。同年9月，夏鼐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夏鼐先生到任的第一天，便与王仲殊先生见面。夏先生此前已得知王仲殊的历史文献基础较好又通日文，便劝导他在学术研究上专攻应将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与历史文献记载充分结合的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故可进而兼攻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夏鼐先生还决定亲自担任王仲殊先生的导师。

王仲殊先生到研究所后，当年10月就参加了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后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河南辉县战国、汉代墓地的发掘。这是王仲殊先生第一次参加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他熟悉了田野考古的全过程，为他日后主持几项重要的考古发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王仲殊先生先后参加或主持了豫西考古调查、北京西郊董四墓发掘、湖南长沙古墓葬发掘、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地区古墓的发掘、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黑龙江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六顶山渤海墓地的发掘，以及河北满城汉墓、山西乔村战国墓、成都凤凰山明墓等一系列考古发掘，这些发掘也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发掘项目。王仲殊先生还先后参加了《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的编写，主持了《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等长篇发掘报告的编写，并快速发表了《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门的发掘》等中篇发掘报告或简报。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内考古工作者甚少，包括在各个大学任教的也仅有区区数十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扩大考古工作者队伍，国家文化部文物局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1955年先后举办了4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的341名学员参加了培训，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郭宝钧、安志敏、王仲殊、石兴邦等多位先生为培训班授课，辅导学员们的田野考古实习。为了更好地培养考古人才，1952年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文物局联合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

王仲殊先生与夏鼐、郭宝钧、安志敏等先生一道，承担了考古专业的授课任务。他们为新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在以夏鼐为主的前辈学者的关怀和指导下，王仲殊先生在研究所迅速成长起来。1957~1965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还曾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先生兼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各个行业都受到冲击，考古工作也未能幸免。大批考古学者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极少数职工留守。1970年，王仲殊先生担任考古研究所留守工作的领导人。他利用修复阿尔巴尼亚委托的重要文物——“羊皮书”的机会，通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上书周恩来总理，将夏鼐先生等知名学者调回北京，使他们恢复专业的工作。他还和夏鼐先生一道，致函郭沫若院长并周恩来总理，建议《考古》和《考古学报》复刊，获得批准，这两份杂志就成为“文革”后期最先复刊的中国学术期刊。在《考古》和《考古学报》复刊的带动下，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科学院的数十种杂志也相继复刊。对于《考古》等学术杂志的复刊，王仲殊先生起了主导作用。

1978~1982年，王先生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所长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1988年，王仲殊继夏鼐之后，被连续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王仲殊于1979年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8年，他再度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2006年，王仲殊先生被授予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今年是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也是王仲殊先生在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65周年。从这个意义来说，可以说王仲殊先生是考古所成长、发展的见证人，也是新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王仲殊先生是在梁思永、夏鼐两先生的引领下走上了考古之路的。受到这两位严格看待田野考古训练的前辈学者的影响，王仲殊先生一直主张重视田野考古工作，重视田野考古资料的刊布，而他所承担的几项重要的考古工作的发掘报告都已完成出版。王先生身体力行，尤其是在他自1978~1988年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期间，他始终坚持把田野考古放在考古研究所业务工作的首位。他对考古研究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使梁思永、夏鼐先生开创的严谨、扎实、注重田野工作、精益求精、艰苦奋斗的作风得以继承和发扬。

王仲殊先生一直致力于加强中国考古学与国外考古学界的交流。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就喜爱日本历史和文学，对日本的和歌、俳句都有很深造诣，曾多有创作，深受好评。他具有较深的中国历史和文献功底，这使他几十年来从事汉唐考古学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几十年来，他在三角缘神兽镜

的产地、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历史事实的解读、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墓主人、《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中的倭国与中国王朝的关系等问题，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日本历史和考古学界定论和体系的创新观点，获得很多日本知名学者的赞同。正因为如此，他在日本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荣获日本福岡亚洲文化奖大奖，成为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的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王仲殊先生不仅自己潜心研究中日交流的考古学，还积极推进中国和外国考古学界的交流。他始终认为，中国的考古学者不仅要对本国的考古学有深入的研究，还应当了解和研究外国考古学，只有这样，才可称为名副其实的考古学强国，也才和我们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地位相称。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从他担任研究所所长时起，我们研究所开始向日本、美国等国家派遣留学生、进修生。据不完全统计，我所近30年来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进修生及中、长期访问学者约达60人次。

王仲殊先生对考古研究所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自1950年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退休，一直未曾调动工作。退休后仍接受考古研究所的返聘，考古研究所是他唯一工作的单位。他虽已年事甚高，但至今仍然每周来研究所，为完成各项学术任务而努力。王先生还十分关心研究所的发展，积极支持研究所领导的工作，常提出事关考古研究所发展的建议。

今年是王仲殊先生90华诞。为了纪念和庆祝，我们研究所的老、中、青同仁们纷纷献文，汇编成这一本纪念论文集。我们衷心祝愿王仲殊先生健康、长寿，学术青春永驻！

王 巍

2015年3月28日

王仲殊先生传略

王 巍

—

1925年10月15日王仲殊先生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是宁波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著名的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培育、熏陶，在古典文学和文献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王先生离开宁波，辗转于嵊州、新昌、宁海各地，历尽艰辛，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46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第一流大学，却就近选择最后考取的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王仲殊听从浙江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

1950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将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先生推荐，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欣然接纳王仲殊于同年8月初入所，并多加指导、勉励，热忱至高。这样，王仲殊便成为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个从大学毕业分配而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可以说，王仲殊先生是考古研究所成长、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1950年9月，夏鼐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之职，不久便担任王先生的导师。在以夏先生为主的前辈学者的殷切关怀和大力帮助下，王先生在工作上迅速成长，研究上多见成绩。1958~1965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又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副所长、所长兼任）。1978~1982年，他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所长夏鼐先生的得力助手。1982~1988年，王仲殊先生继夏鼐先生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的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王仲殊先生于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至今，又改任学位委员会委员之职。

此外，1979~1988年王仲殊先生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1985年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主编，1996~1999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2002年以来又任《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1988~1998年，王仲殊先生连任第7、第8两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仲殊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则授以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先生为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其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这更是十分难得的荣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1966年以后的所谓“文革”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皆被迫停业，唯独考古研究所因受周恩来总理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仲殊先生受命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凭借其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之间的亲密交往关系，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先生、安志敏先生等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研究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仲殊还与夏鼐先生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复刊以应国内外需要，立即蒙周总理批准，乃使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事业的新的光辉历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仲殊先生身上显得格外清楚。众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先生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先生一样，王先生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一些不良的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仲殊先生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事渲染。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这是王仲殊先生的治学之道。

二

1948年冬，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夏鼐先生拒绝迁移台湾，坚决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夏先生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直至1950年夏末。当时，王仲殊已转学到北京大学，与夏先生不曾相识。然而，夏先生在浙大任职期间，多次听谭其骧教授（历史地理学）、夏禹勋教授（日语文）等老师言及王仲殊在学业上的优秀成绩，印象至深。

1950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夏鼐先生自杭州乘火车到达北京。次日一早，他初次

与王仲殊在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室见面，立即为王仲殊指引治学的方向。夏先生熟知历史文献和日本语文是王仲殊在学业上的优势所在，故明确主张王仲殊应专攻在研究上必须充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发掘相结合的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故可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数十年来，夏鼐先生指引的治学方针始终为王仲殊所遵循，直至今日而不改。

1950年10月初，王仲殊便跟随夏鼐先生到河南省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正是遵照上述夏鼐先生为他规定的专业方向，王仲殊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的对象几乎全是汉代墓葬。由于夏先生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开始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1951年4月至7月，夏鼐先生还带领王仲殊到河南省从郑州到浍池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对各个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决定以汉唐时代考古学为专业的王仲殊也参加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由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汉代墓葬在发掘工作的操作上各有特点，互为补充，从而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的知识。

此后，就较为重要的项目而言，王仲殊先生先后参加了湖南省长沙的汉代墓葬、陕西省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河北省满城的汉代陵墓、吉林省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龙江省宁安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等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1962年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由他主持，使他成为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所获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的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规模大、效率高，收获丰富，为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的开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先生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评，并荣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在长期的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王仲殊先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本人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前已述及的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又有个人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的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书，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论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黄初”、“黄武”、“黄

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个人独著的论文共约数十篇，其中不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仲殊先生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先生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铜镜》《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漆器》《汉代陶瓷器》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开头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为夏鼐、王仲殊两先生共同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并有条不紊地叙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内容详细、充实，论据确切可靠，至今仍是

三

如前所述，按照夏鼐先生为他设定的治学方针，王仲殊先生在研究以汉唐时代为中心的考古学的同时，也注重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早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王仲殊大量阅读日本的古代文献及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和古代史书刊，以求充实自身的基本知识，并把握对方的学术动态。考古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甚丰，除中国本国的书籍、刊物以外，也有不少外国的书刊，尤以日本的为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前称北京图书馆）皆兼藏日本文科方面的大量书籍、刊物，应有尽有，自可充分借阅，而王先生个人收集日本书籍、杂志、报刊颇多，更可随手检阅，十分便利。从1981年开始，王先生应邀访问日本，至今已达25次之多，每次都在日本参加考古学·古代史讨论会，作公开的学术讲演，顺便赴各地考察古迹，参观博物馆等，又为他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开创新的必要的条件。

经过长期的努力，王仲殊先生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现于各种专著和许多论文，它们多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有些论文则是由王先生本人直接用日文写作的。在专著方面，计有共著或独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共著）、《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共著）、《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共著）、《古代日本的国际化》（共著）、《三角缘神兽镜》（独著）、《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独著）、《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共著）等书，而王先生独著的各种论文则已多达数十篇。除1981年以来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对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日本古代铜镜研究的两大系列论著将在

后文专门介绍以外，这里先以早在1959年发表的《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和1972年发表的《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两篇论文为例，稍加叙说。

在江户时代中期的1784年2月，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印在日本九州北部的志贺岛（今属福冈市）出土。据计测，印面为2.35厘米见方，纽作蛇形，通纽高2.23厘米。印文“汉委奴国王”五字，篆体，阴刻。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记，这显然是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予倭的奴国之王的。所刻“汉委奴国王”五字应理解为“汉·倭·奴国王”，而“委”字则为“倭”的简体。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末，日本研究者众说纷纭，多有异论，特别是怀疑其为贋作，不是真品，主要的理由是印纽作蛇形，印文为刻凿而非铸就，不合規制云云。

1956年12月，我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西汉滇国墓出土1枚金印，印面2.4厘米见方，纽作蛇形，通纽高1.8厘米。印文“滇王之印”4字，篆体，阴刻。作为发掘单位的云南省博物馆举出各种理由，认为此印不是中国西汉王朝所赐，而是滇国本民族自制。但是，王仲殊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表《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文，在否定云南省博物馆的意见的同时，确认“滇王之印”金印应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为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赐予。王仲殊先生以“滇王之印”印纽亦作蛇形，印文亦出于刻凿为主要依据，指明日本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真品而非伪作。从此以后，怀疑论的迷雾消散，作为2000年来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见证，金印发出更为灿烂、明亮的光辉。

1972年3月，在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发掘了高松冢古坟。古坟石室内有着保存良好的壁画，其内容包含四神图、天象图和男女人物像等，绘描优美，装饰精良，色彩鲜明，实属空前大发现，轰动全国。王仲殊在郭沫若先生处得见快速送来的日本报纸关于高松冢古坟的详细报道，乃执笔撰作《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之文，发表在复刊不久的1972年第5期《考古》上，立即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九州大学教授冈崎敬迅速将此文译为日文，转载在同年12月初出版的日本有名的《朝日杂志》。此后，王仲殊先生又连续写作《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问题》《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与被葬者》等论文，皆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文，刊登在日本出版的书刊上。

王仲殊论文的独到之处在于指明高松冢古坟出土的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与我国陕西省西安市洪庆村早已发掘的唐代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属大小、轻重、形状、花纹完全相同的“同范镜”，而独孤思贞墓志明记其人死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次年神功二年（公元698年）葬入墓内，说明铜镜的制作年代在7世纪末。因此，王先生判断高松冢古坟的海兽葡萄镜是由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年）来访长安的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第七次遣唐使于庆云元年（公元704年）携归日本的，从而推定高松冢古坟的筑造年代不在7世纪末而在8世纪初，进而主张古坟所葬为天武天皇之子、官居“知太政官事”的忍壁亲王。忍壁亲王受命负责编撰《大宝律令》，热衷于仿效中国唐代的制度、文化，而高松冢古坟壁画深具唐风，其

题材、格式正与忍壁亲王的身份、职务相称，绝非偶然。王仲殊先生的观点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有的学者则明确表示赞同。直到30余年以后的2004年10月，王先生还应邀到日本京都，就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再作讲演，受到热烈的欢迎。

四

古代日本在各方面的制度上广泛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而都城制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王仲殊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功底深厚，对古代中日两国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自亦得心应手，多有创见。

王先生在这一重大研究领域上发表的许多论著，应当首推《考古》1983年第4期所载《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该论文就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的深厚影响作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明确主张7世纪末至8世纪的日本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在形制、布局上仿效7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而不是仿效5世纪末至6世纪前期的北魏王朝的都城洛阳，从而否定了当时在日本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岸俊男先生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迅速将王仲殊先生此文译成日文，转载于日本的《考古学杂志》上，加之此前新闻媒体所作的许多报道，使得王先生的论点广泛传播，一时成为历史、考古学界乃至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从此以后，除个别例外，一般的研究者多沿用王仲殊先生之所说，没有大的异论。性情温和、态度谦虚的岸俊男先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的学说不无保留，却承认王仲殊论文具有说服力，从而不作争论和反驳。岸俊男先生的宽厚、大方的风度，使王仲殊先生深受感动。

经过16年的长期间隔，王仲殊先生从1999年开始，才继续就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执笔为文，到2004年为止，共完成《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8篇论文。各篇论文的题材、内容各有不同，正体现了王先生对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所作比较研究的全面、系统和无所不包的深入程度。这里，因限于篇幅，只就最具特色和最有创见的《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和《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两篇论文作简单的介绍。前者刊登于《考古》1999年第3期，后者刊登于《考古》2004年第10期，是上述8篇论文中的首篇和末篇，一前一后，为王仲殊先生对于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作重新的开始和最后的终结。

据20世纪70年代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全面发掘，8世纪前期日本平城京

宫内第一次大极殿建立于高为2.2米的、可以称为“龙尾坛”的大坛之上，这显然是出于对唐大明宫含元殿的模仿。龙尾坛在其前面左右两侧边缘处各设一条斜坡道以供升登，而坛的前面中央部分则无台阶之类的设施。1981年7月，岸俊男先生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个人见解，认为龙尾坛前面中央处应有一条木造的阶梯，以便升登殿上，只因年久枯朽，不留痕迹，故未曾发现。于是，许多学者按此见解，绘描大极殿龙尾坛的复原图，突出坛前木造的大阶梯，公开发表，竟成定论。

另一方面，早在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先生负责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在发掘报告中明确认定龙尾道的位置在殿前的正中央处，建筑学者据以作成复原图，国内外学者皆信以为真，毫无异议。但是，1995~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为队长的西安唐城工作队的大规模发掘证明，含元殿前面正中央处根本不存在任何阶道，从而在考古研究所内部引发了关于龙尾道问题的激烈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王仲殊先生撰作题为《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的论文，主要是参照《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史书记载，尤其是根据13、14世纪日本“九条家图”“近卫家图”等古图所绘8世纪末、9世纪以降的平安京宫内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二条台阶分别设在坛的左右两侧近边缘处的实况，确证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龙尾坛的前面中央处不可能设有所谓木造的阶梯。日本学者读此论文，多加认同，而马得志先生亦承认当初发掘含元殿时因限于各种条件，对龙尾道遗迹的探测失误，从而使中日两国考古学界两全其美，各自维护了含元殿龙尾道和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真相。其实，就中国方面而言，据《两京新记》《剧谈录》《西京记》《长安志》《南部新书》《唐语林》等唐宋时代书籍记述，唐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龙尾道正是分为左右二股，各沿“翔鸾”、“栖凤”两阁盘曲而升登于殿上的，是属毋庸置疑。

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从来都局限于都城内部的宫殿、里坊、街路、市场、寺庙等项，而不及于都城的郊外。学者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都城郊外多设各种礼制建筑物，而日本都城郊外则无类似的设施。无待于言，这是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差异之一。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在唐长安外郭城南面正门明德门外发掘了唐代圆丘的遗址，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王仲殊先生以此为契机，撰作题为《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的论文，打破了历来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局限于都城内部而不及于郊外的旧例，可谓别开生面。

王先生在论文中根据《续日本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日本史书的记载，确认日本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分别于8世纪后期的长冈京和9世纪中叶的平安京南郊交野郡柏原之地（在今大阪府枚方市片鉾町附近）设圆丘以祀天神的事实，又参照《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中国唐代的文献、典籍，证明当时日本天皇于十一月冬至

之日在圆丘祀天神的制度仿自中国唐王朝，乃至礼仪的程序、祭祀的配享以及祭文的文章、字句等几乎全都与中国相同。就史书记载而言，日本冬至祭天的郊祀制度虽仅限于桓武天皇、文德天皇二代，却亦足以否定所谓日本古代都城郊外完全没有礼制建筑物的笼统之说。

五

在王仲殊先生对于日本考古学的研究中，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是最大的课题。自1981年以来，王先生在中国的《考古》等刊物上先后发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地方的交往》《论日本出土的吴镜》《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等专题论文，加上前述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青羊”为吴郡镜工考》《“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等可作参证的关于中国铜镜研究的论文，共计约有20篇。这许多论文大都已由尾形勇、杉本宪司等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著名学者西岛定生先生监修下编集成一本以《三角缘神兽镜》为题的专书，1992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98年再版。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日本学者富冈谦藏早已主张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3世纪中国三国时代的魏镜，包含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魏朝皇帝于景初三年、正始元年（公元239~240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百枚”之内，这便是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1953年以小林行雄为首的日本学者发掘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计30余枚之多，引起轰动，乃使对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而小林行雄则成为研究此类铜镜的权威，大量联系古代政治历史，提出所谓“同范镜”理论，为日本学术界所信奉。

1957年4月至6月，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樋口隆康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其所到之处的许多中国的博物馆、研究所等广泛搜寻三角缘神兽镜，竟然一无所见。但是，他和小林行雄一样，不以为意，依然坚持“魏镜说”而不改。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快速进展，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数量不断增加，大大超越了《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铜镜百枚”之数。然而，固执“魏镜说”的学者不加反思，继续大肆宣扬，声称倭国使者访问魏王朝及其后的西晋王朝共有4次或5次，每次受赐铜镜，总共可达数百枚，不足为怪，至于中国全境始终绝无三角缘神兽镜的发现，则是由于此类铜镜是中国皇帝专门为赏赐倭王而特

铸，故不在中国本国国内流传，云云。这便是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的“特铸说”，其出于日本著名学者之口，使王仲殊先生惊异之余，深感遗憾。

王仲殊先生自1981年访问日本以来，在日本各处得见大量三角缘神兽镜的实物，仔细观察，增强认识。经过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进行周详、深入的比较，王先生就三角缘神兽镜问题的研究创作论文近20篇之多，已如前述。归纳他的观点、论旨，主要有以下各项：

(1) 通过近年对奈良县天理市黑冢古坟等古坟的发掘，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出土的总数至今已达500余枚，而此种铜镜在中国全境却依然一无所见，故可断言它们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所制作。

(2) 与中国同时期的铜镜相比，三角缘神兽镜在形制、图纹上有独特之点，不可笼统地与中国所产铜镜混为一谈。

(3) 尽管如此，由于三角缘神兽镜大体上与中国铜镜多有相似之处，加之铭辞中有“陈氏作竟（镜）”“张氏作竟”“王氏作竟”等明确之语，可证其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作，而日本当地工匠作为助手，不起主要作用。

(4) 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形制、纹饰与中国画像镜相似，内区的图像则与中国神兽镜类同，而画像镜、神兽镜盛行在中国江南的吴地，罕见于黄河流域的魏的境域，故三角缘神兽镜应为吴的工匠而非魏的工匠在日本所制作。

(5) 许多三角缘神兽镜都有详细的铭文，其辞句、款式、内容与一般中国铜镜的铭文相似，丝毫没有言及皇帝赐镜等情，足证所谓“特铸说”乃无稽之谈。

(6) 日本学者主张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魏朝皇帝所赐之镜，最为重要的依据在于镜铭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但是，在“景初”“正始”纪年镜的铭辞中，工匠陈是（氏）自述经历而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本自州师，杜地命出”，可证陈是（氏）其人本为中国吴地扬州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吴时称其地为“京”，东晋称“京口”）的镜师，因故亡命于日本，在日本作镜。

王仲殊先生认为，由于景初三年、正始元年是倭使首次访魏之年，值得纪念，其年号为在日本作镜的中国工匠纪入铭辞，无足为奇。应该特别指出，1986年10月在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发掘广峰15号古坟，出土了有“景初四年”纪年铭的盘龙镜，铭文的书体和字句可证制作此镜的工匠陈是（氏）与制作“景初三年”“正始元年”铭三角缘神兽镜的工匠陈是（氏）属同一人。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于景初三年正月病亡，继位的少帝改次年为“正始元年”，根本不存在所谓“景初四年”。正是因为陈是（氏）等人在日本作镜，与中国本土相隔远海，消息欠通，不知魏朝改元之事，乃继“景初三年”之后，在镜铭中使用“景初四年”的纪年。以后发觉“景初四年”纪年有误，乃改用“正始元年”的纪年，以做纠正，实属通情达理之事。

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日本早有1枚“景初四年”铭盘龙镜被主张“魏镜说”的权威学者授意严密隐藏在某处的一所考古资料馆内。广峰15号坟“景初四年”铭盘龙